

# 引用的女性政治

撰文／吳虹霏

克萊兒·畢莎普 (Claire Bishop) 在 2023 年引起藝術圈熱議的文章〈資訊過載〉 (Information Overload) 中，深度闡述了愈趨常見的「研究型藝術」 (research based art) 的演進，以及其與數位科技的發展、歷史和知識的建構與傳遞的交織關係。文末，畢莎普舉安娜·波希桂安 (Anna Boghiguian) 2015 年作品〈鹽商〉為例，認為其成功地將研究內化、具身化，而無須以美學或個人藝術特質做為交換，這讓我想起近兩年探索中的「引用」方法。當所謂研究型藝術欲與女性主義和後殖民理論並肩，致力於去中心化與反知識的權威及宰制

之時，引用的女性政治，除了讓作品／展覽不致落於超量的資訊或檔案再現，體現個人對引用源頭的關係與啟發外，更是有關於道德、抵抗，以及更積極的連結與團結意義。

## 權力、抵抗與知識生產

莎拉·阿赫米德 (Sarah Ahmed) 在 2017 年的《過一種女性主義者的生活》中提醒我們「引用」所反映的價值選擇與權力關係，意即，我們應留意知識的建構與傳播背後習以為常的結構和系統性不公。在其眼中，「引用」是「我們如何肯認我們所虧欠的，也就是那些先於我們來到此處的，以及那些在迷途之

時，為我們指路的」。評論人許楚君在回應筆者策畫的展覽「作浪」的文章中，對於「引用的政治」 (Politics of Citation) 做了深刻的詮釋：「引用」不僅因此成了女性主義防禦工事的磚瓦，這份「壞名單」也將成為一份重要的索引，一則一則「引用」與它們身上攜帶著的差異，隨時裂解意圖將之收編的歷史論述。這毋寧是一種深具政治意味的抵抗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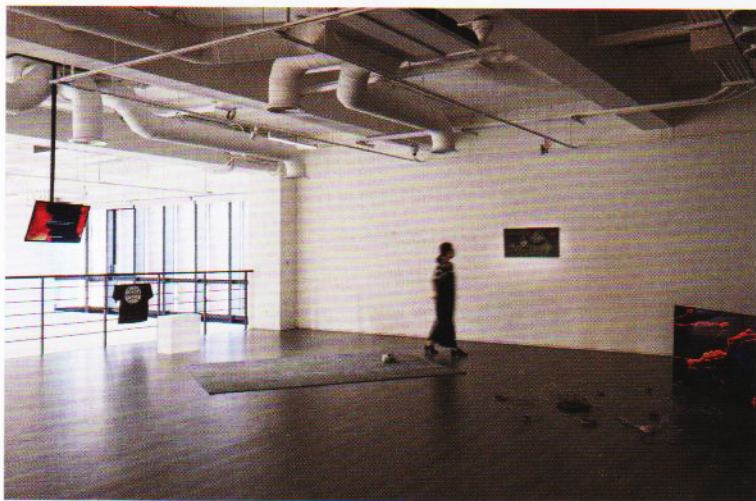
就筆者的研究與實踐角度，這即是對「另類知識」的關照和學習——那些始終未被書寫、聆聽、傳遞於主流社會，卻得以在漫長的壓迫歷史中存續至今的智慧，或許正能幫助我們理解眼前衝擊著所有生命的行星級災難的複雜現實，從中找到棲身之處，共同扶持與存活。而我們如何挖掘、引用這些智慧而不致形成另一種剝削，如何找到對的語言連結彼此而不是堆砌另一堵知識高牆，這些往往是位於封閉與線型藝術生態系的生產者角色（無論是生產作品或是展覽）常須面對的自我質疑。

學術引用的種族與性別盲區，其實在更早的 1991 年就由女性主義學者凱蒂·金 (Katie King) 在她的文章

〈書目和女性主義文學工具〉 (Bibliography as Feminist Apparatus of Production) 提出。1970 年代晚期雷諾兒 (Lenore Hoffman) 的工作坊，引導學生發起對於學的集體地方性研究，其挨家挨戶拜訪以找出當地文獻記載的寫詩女性。這份「壞名單」得以將學院中心化，也讓參與的學生另類的研究方法賦能於自身。金更指出每個研究者政治的介質：「要說出關於生產的故事，需要女性主義其中，而不只是待在一個觀看與分析位置。」而此論的典範轉移，在當代藝術中是如何被實踐？再者，藝術家化為研究者，怎麼論述價值，當其研究轉化為生產，透過這所謂的「政治」又生產了什麼新的「知識」？

## 從系譜展開連結：身體引用

阿斯特里達·奈伊曼 (Astrida Neimanis) 在《水體》 (Bodies of Water) 中支持阿赫米德的引用政治於債務的肯認，並進一步「水性」引用政治，盼望更積極的連結與續命意義。引用政治，即是挖掘已然身體與物質之中的連結特性。每個身體都是一個獨特的，在身體重複書寫著、澆灌著、母、祖先的基因，也是自己的環境物質，既是隱



「作浪」展場一景 (圖版提供：本誌藝術)

